Ethics & Public Affairs

伦理学与公共事务

第8卷

主　　编　李建华

执行主编　冯昊青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伦理学与公共事务,第8卷 / 李建华主编.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12
ISBN 978-7-308-20607-5

Ⅰ.①伦… Ⅱ.①李… Ⅲ.①公共管理－伦理学－文集 Ⅳ.①B82-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81435号

伦理学与公共事务(第8卷)

李建华 主编

责任编辑 陈逸行 陈佩钰
责任校对 郭琳琳 严 莹
封面设计 雷建军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良诸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36千
版 印 次 2020年12月第1版 202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20607-5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cbs.tmall.com

《伦理学与公共事务》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李建华

执 行 主 编： 冯昊青

副　主　编： 左高山　曹　刚　肖　祥

编辑委员会： 李建华　左高山　曹　刚　周志山　冯昊青　周谨平
高恒天　丁瑞莲　刘立夫　王　琨　肖　祥　应小丽
林晓珊　邓佑文　李西祥　项溢煦　徐正铨

《伦理学与公共事务》
学术委员会

顾　问：杜维明　卓新平　曾钊新　唐凯麟

主　任：万俊人

副主任：郁建兴　李建华

委　员：（排名不分先后）

万俊人　清华大学
薛　澜　清华大学
唐文明　清华大学
何怀宏　北京大学
王浦劬　北京大学
俞可平　北京大学
焦国成　中国人民大学
姚新中　中国人民大学
张康之　中国人民大学
邓安庆　复旦大学
姚大志　吉林大学
郁建兴　浙江大学
徐向东　浙江大学
樊和平　东南大学
陈振明　厦门大学
余　涌　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
江　畅　湖北大学
王淑琴　首都师范大学
张怀承　湖南师范大学
张涌泉　浙江师范大学
张　法　浙江师范大学
刘鸿武　浙江师范大学
郑祥福　浙江师范大学
李建华　浙江师范大学
左高山　中南大学
卢德之　华民慈善基金会
Daniel Bell　清华大学
Stephen Macedo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Thomas Poggie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Thmoas Scanlon　美国哈佛大学
Will Kymlica　加拿大麦基大学
Eduado Mendieta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目　录

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

论作为文化自信的中国伦理自信　　李建华　肖　祥(3)

《共产党宣言》的伦理意蕴及其现代阐释

——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共产党宣言》基本伦理精神的阐释和发展

王文东(21)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的四个阶段

——在第五届全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论坛上的发言　　李义天(48)

与列维纳斯一同解读马克思　　[美]塞拉普·A.卡亚特金　杰克·阿马里格里奥

张啸尘　项溢煦　译(53)

中国传统伦理研究

打破社会平行概念:清朝中前期丧礼的科层化　　[美]诺曼·库彻

季静媛　吴　旭　译(75)

女性伦理的历史溯源与现代转型　　周　赟(99)

公羊学“贵让观”探微　　王　磊(116)

西方政治伦理问题研究

生还是死:从苏格拉底的抉择看理性对死亡的超越　　李　石(137)

杜塞尔解放哲学的未来图景:重建乌托邦　　李伟伟　冯昊青(144)

现代性危机的原罪与救赎

——基于阿多尔诺的摹仿思想　　胡　超(152)

公共伦理学研究

人的安全:理论争议与学者观点　　[俄]齐甘科夫

李冠群　译(165)

相互承认的国家与个人

——以香港中文大学学位颁授典礼为中心　　姜文昕　鲍　嵘(175)

论设立未出生的后代的环境权之必要性　　胡义清(18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

- 论作为文化自信的中国伦理自信
- 《共产党宣言》的伦理意蕴及其现代阐释——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共产党宣言》基本伦理精神的阐释和发展
-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的四个阶段——在第五届全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论坛上的发言
- 与列维纳斯一同解读马克思

论作为文化自信的中国伦理自信

李建华　肖　祥*

全球化浪潮汹涌激荡，西方价值强势与伦理话语权“西强我弱”的挑战依然严峻，西方国家质疑中国崛起的伦理价值的杂音仍不绝于耳。如美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前主席罗伯特·柯白(Robert A. Kapp)认为：中国崛起遭遇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困境，中国软实力影响微乎其微，是一种不包含道德或规范意义的崛起。[①] 当然，中国道路的成功并非仅仅是经济总量和经济地位迅速上升，但不能否认的是支撑中国道路崛起的伦理价值并没有充分彰显出来。正如国家的存亡兴衰几乎都可以在其国家伦理价值观的传承中找到深层的答案一样，中国道路定然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种没有价值观的崛起。对中国道路成功的认知如何从经验层面上升到伦理价值的高度？中国道路如何展现时代精神？中国伦理自信的建立已然成为当下紧迫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伦理自信的文化和精神维度

伦理之功用即通过善的价值理念倡导和规范约束为人类社会交往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秩序。伦理对于良性的人际交往和群际交往必不可少，对于国家成长和国际交往之重要性也自不待言。在国家发展和国际交往中，伦理自信不仅展示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自觉，也展示国家的精神风貌和整体力量。所谓伦理自信，就是主体(包括个体、民族和国家)在对国家发展的主导伦理价值(传统和当代伦理价值的融合与创新)发自内心的自我肯认和自觉相信基础上形成的自尊、自励、自强的心理态度，以及由此形成的积极、进取、健康的精神状态。伦理自信源于文化自信，其内核是精神自信。

---

*　作者简介：李建华，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肖祥，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及前瞻研究”(项目编号：18AZX018)阶段性研究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16ZDA103)阶段性研究成果；教育部“阐释十九精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研究”(18JF157)阶段性成果。

①　柯白、魏柳南等：《激辩中国道路——世界中国学论坛观点集萃》，《社会观察》，2013年第4期，第8—11页。

（一）伦理自信的根基：文化自信

伦理自信总是基于对以往文化中伦理价值的认识和传承、对现有文化中伦理价值的自觉和把握才得以形成的，即是说只有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伦理自信，也只有建立在文化自信之上的伦理自信才是坚实和深沉的。

文化孕育了伦理价值意识并推进伦理价值的实现。一方面，在文化的产生、积累和创造过程中，人们形成了对价值和意义的认识，由此获得了伦理价值意识，并借此不断确证人类自身的本质和特性。离开文化或舍离文化世界的价值意义，人不仅不能准确地认识外部世界对自我的存在价值，也不能觉知自我的价值需要，也就无法建立起外部存在价值与人自身价值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人的生存就可能陷入“无意义的存在”。简言之，伦理价值意识就是在文化世界中的一种“意义”建构。因此，文化愈发展，人的伦理价值意识愈明晰；文化愈进步，人的伦理价值意识愈高尚。另一方面，就价值实现理论而言，文化推进伦理价值实现。在文化实践活动中，人一旦对诸如食、色、性等生存本能欲望有了主体的自主自觉，生物需要就转化成了伦理价值需要；当伦理价值需要主体化为伦理价值意识，并以心理结构和观念形态得以固定时，人就形成了伦理价值判断、伦理价值选择和伦理价值思维，这就是伦理价值的实现过程。

文化自信催生伦理价值自信。文化自信是民族、国家以及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生命力持有坚定信心。真正的文化自信表明一个国家的文化心理结构不断成熟，并且作为文化心理结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伦理价值要素得以提炼、结晶和闪光。相反，文化不自信要么表现为对文化传统价值的“虚无主义”或“文化自虐”，要么表现为对传统文化价值的“盲目自大”或“文化自恋”，二者都丧失了对文化传统中伦理价值的自知、自觉和自信。对文化中伦理价值的高度凝练、肯定和赞许，将促进主体对自身价值的肯定、价值主体意识的增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能力的提升、对外界价值权威的主体克服等，并不断地烙刻在民族的心理、观念和精神发展中，呈现为伦理价值秩序，最终成熟为伦理价值自信。当前，在价值平面化和价值虚无主义盛行的现代化进程中，“诸神消失”“世界祛魅”“遭遇虚无”成为世界普遍的价值样态。跳出“价值怪圈”、增强伦理价值自信，关键就是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铸魂工程”，其根本目的是实现“人民有信仰”。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沉着冷静地应对西方伦理价值观念的“现代性入侵”（inbreak-of-modernity），增强自信，坚定信念。

（二）伦理自信的内核：精神自信

在文化创造的实践活动中，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民族最珍贵的、最重要的伦理价值

总会被主体吸纳而升华为理想性和精神性的自觉追求，这就是伦理精神。“伦理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积淀，是伦理文化的精华”①，它渗透到民族、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主体的精神特质，伦理自信就会以精神自信的方式展现社会主体和国家的精神风貌。

精神自信源自民族精神的积淀。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历史生活中形成的，体现着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由此成为一个民族发展的核心和灵魂。无论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价值目标的设定，还是追求“天人合一”“和为贵”“道法自然”的重和谐的价值偏向，抑或是对“重义轻利”“贵义贱利”“立德立功立言”等个人道德价值要求的重视，无不渗透着以“道德的人”促进“道德的社会”的家国情怀。尤以为傲的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伦理精神的内核，薪火相传，从未失落，成为国家成长过程中恒久弥新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精神自信，就是要对构成民族精神的那些能够沟通古今、影响后世的共通性的伦理价值有一种主体认同和积极赞赏；就是要自觉弘扬民族精神中蕴藏的具有导向性、目标性和动力性的伦理价值观念和伦理价值追求；就是要创新发展促使中华民族在经历无数次大风大浪后依然保持高度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爱国主义精神。

精神自信展现于时代精神的弘扬。时代精神是对时代文明的抽象和概括，是一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反映了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风貌。黑格尔说它是扬弃了旧原则的带来历史新的冲动的“一个新的原则，一个新的民族精神”②。新民主主义时期，时代精神表现为“保持英勇气概、革命热情”的精神；改革开放初期，时代精神表现为“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期，时代精神表现为“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尊重科学、真抓实干，顾全大局、团结协作，谦虚谨慎、崇尚先进，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精神和创新精神”是时代精神的重要维度。时代精神因其现实性、创新性、前瞻性特征而成为一个民族奋发图强、一个国家振兴的强大精神动力。时代精神的主题化，体现在其价值引导力和凝聚力上。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要凸显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伦理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自信”不是一种精神意志的自我陶醉或自以为是，也不是一种毫无根基的心理张扬或经验自夸，而是一种嵌入时代精神的伦理自信。促进文化自信和精神自信的有机统一，彰扬中国道路的伦理自信，保持中华民族伦理精神的独立性，正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

① 宋希仁：《当代外国伦理思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17页。

二、中国伦理自信之必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性评价,也不是对其发展成就的宣示性总结,毋宁更准确地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基点和全新征程的准确认知。这种判断既表明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时代性的准确把握,也表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发展需要物质性力量的推动,更需要精神性动力的支撑,甚至在很多时候,包蕴着思想、文化、信念、志向、气魄等要素的精神力量能够焕发出比物质性力量更强大、更有效的动力。

(一)“强起来”需要伦理自信

“强起来”是“站起来”“富起来”的承接和延续。如果说“站起来”“富起来”是一个历史比较问题,那么“强起来”则是一个时代性的国际比较问题。在这个伟大飞跃过程中,伦理自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致力于实现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价值引领,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来,面对深重的内忧外患和民族危亡,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以李鸿章、曾国藩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掀起了洋务运动却没有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了“戊戌变法”倡导科学文化和学习西方,却因封建守旧势力太过强大而夭折;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等农民起义将斗争矛头分别指向清政府和帝国主义,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未能使其担负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掀起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但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其后,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们重视伦理在政治解放中的重要作用,对中国封建专制伦理(尤其是孔孟之后经帝王专制化后的儒家伦理)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以之为反对封建专制、求得解放的精神武器。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指出,中国欲望政治问题之解决,必有待于吾人伦理的觉悟,“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①。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传入使得中国革命的精神风貌有了全新的

①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 年版,第 108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气象,“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成为“不可逃的命运”。[①] 其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践又带来了政治伦理思想的变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不仅仅是国家制度的宣告,更是民族独立的主体性宣示,标志着价值主体的真正确立。在中国“被迫现代性”的紧要关头,毛泽东明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的价值导向,挺立了中华民族的伦理自信,使得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有了新的理论武器和精神力量,空前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悟和民族自信。

社会主义伦理价值导向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致力于实现中国人民“富起来”的价值引领,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发展的光明前景。1978 年之后,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迈入了如何“富起来”的征程。社会主义伦理价值导向的确立,首先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关系着怎样坚持社会主义伦理价值导向、怎样看待和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因为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的价值目标设定,民众对社会主义本质有了明确而直接的理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高度的价值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伦理自信有了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其次,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伦理价值的基本原则,不仅肯定集体利益和社会共同利益的权威性,也充分肯定个人利益的合理性,为凝聚广大人民力量实现“富起来”提供了伦理保障。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和实现着中国人民“强起来”的价值引领,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之路。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入新时代,如何“强起来”成为中国发展的目标追求。就心理认知而言,一方面,“强起来”以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强大为基础,但是“强起来”更需要自我从心理和精神两方面获得自知、自尊、自信的支撑,而最能支撑“强大心理”的精神要素就是文化自信中的伦理价值,它是获得自我肯定和价值认同的“激发点”。另一方面,“强起来”还需要在别人眼中和心里获得认可、赞许和尊敬。在国际比较中,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发展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但是对中国道路的伦理价值的质疑从未停歇过。例如,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作为“中国发展不确定论”的支持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曾断言中国缺失引领自身市场经济的价值理念,因此中国的改革不会成功。美国美中贸易委员会前主席柯白和法国前外交官魏柳南都认为,中国模式将遭遇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困境。[②] 这种批评和质疑并不能打击中国的伦理价值自信,相反却警醒我们:伦理价值作为软实力在国际交往中何其重要,以及向世界展示中国伦理自信多么必要!

---

①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 年版,第 321 页。

② 柯白、魏柳南等:《激辩中国道路——世界中国学论坛观点集萃》,《社会观察》,2013 年第 4 期,第 8—11 页。

（二）“聚人心”需要伦理自信

对于任何一个群体或民族及其生活而言，伦理都是具有实体性的，也就是说伦理总是历史地、逻辑地并且现实地存在着，在人类生活实践中得以展开。正如黑格尔曾言：“伦理行为的内容必须是实体性的，换句话说，必须是整个的和普遍的；因而伦理行为所关涉的只能是整个的个体，或者说，只能是其本身是普遍物的那种个体。”①在黑格尔看来，实体即共体，是公共本质或普遍本质，反映的是具有必然性、普遍性的社会关系。尽管黑格尔将伦理实体理解为绝对精神在客观精神阶段的真理性存在，但是他从伦理关系维度上把握伦理实体，并指出“伦理关系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客观内容，存在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之中”②，这无疑是极具启发性的。事实上，伦理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实存关系，渗透并表现于血缘、政治、经济等实体性结构中。因此，无论是纵观中国传统伦理“血缘—家庭—族群—国家”的实体性结构，抑或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伦理关系作为特殊的社会关系，总是维系、影响、主导着社会生活，推动着国家向前发展。古今中外国家的发展事实已经证明，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建构一种主导性伦理价值理念，并形成一种理性认同和心理自信，用以维护和推动社会良性运行。换言之，如果没有共同的伦理价值理念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渗透并在其中起作用，就不可能建构起良善和正义的社会结构秩序，也不可能提升全社会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水平。因此，“聚人心”必须以伦理价值认同为基础。

伦理自信何以能“聚人心”？一方面，从社会结构关系的视角看，伦理自信是建构良善和公正社会秩序的根本动力。现代社会的生活实践纷繁芜杂，以致矛盾和冲突随处可见，法律制度固然是应对和解决“剧烈”社会冲突和矛盾的有效途径，但是，唯有良善和公正的社会结构秩序才能有效纾解和消除那些无处不在的“非剧烈”的社会冲突、矛盾和怨恨，也就是说，如果忽视和舍弃了伦理的力量，良性的社会运行是不可能的，“聚人心”也就无从谈起。就此意义而言，伦理自信标志着社会民众的理性共识和价值追求实现了充分提高。另一方面，从日常生活层面看，伦理自信是达成道德共识、提振道德水平、凝聚精神力量的关键。伦理自信的力量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在主体价值观念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中，伦理自信能够有效整合价值观念，使善好、正义等理念成为异质化现代社会共有的一种社会向度。今天，丰润的道德滋养和充分的伦理自信已然成为实现“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强大精神动力。

---

①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页。

②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阳、张启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75页。

（三）“文化兴”需要伦理自信

文化自信为伦理自信提供营养，但是伦理自信作为一种价值力量反过来又推动着先进文化建设，尤其在文化多元、价值观激烈碰撞的当今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兴旺发达需要伦理自信的引导和支撑。

“文化兴”需要塑造伦理自信以反对“侵略性”的伦理价值观念的侵扰、破坏和颠覆。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境遇中，建立独立、自主、自信的伦理价值观念是保持独立文化思维、平等文化交流和有效文化吸纳的前提和基础。西方发达国家在“文明”的掩护下或“武力”的威胁下推行文化霸权，大肆宣扬“实用、民主、自由”的价值，迫使其他国家放弃自身独立的价值立场，抛弃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念。文化霸权的实质就是妄图通过文化思想的渗透，将其伦理价值观念强加给其他国家，妄图影响和改变别国的价值观、文化模式，甚至是社会制度，从而达到征服与控制的目的。没有自身独立伦理价值系统的坚守，就没有独立的文化思维方式，就会陷入被文化霸权欺凌的困境，就不可能有国家的文化传承、发展和繁荣；没有基于自身伦理价值系统而确立的自主、自足和自信，就不能真正实现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独立走向世界，从而不可能真正实现“文化兴”。

伦理价值观念不断自我更新、充实和完善，推进国家文化的发展和创新。首先，伦理价值观念的革新实现了革命文化及其文化精神之“兴”。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封建主义伦理价值观念和资产阶级伦理价值观念的双重的政治伦理批判，使得民主、独立、自由、平等的伦理价值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传入中国，给予了灾难深重的中国希望之光。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中国化，翻开了中国文化建设崭新的一页。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① 中华民族伦理自信的挺立，推进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其次，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逐渐深入人心，开拓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新气象。随着对社会主义道德本质、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荣辱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认识的深化，我们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推进和发展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综而观之，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总是从伦理价值的更新和伦理自信的塑造中明确方向、确立目标、获取力量，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从而实现中华文化生生不息、辉煌发展。

（四）“走出去”需要伦理自信

“走出去”不仅是经济实力的展示，更应该是伦理价值的贡献。“走出去”不仅仅意味着在国际交往中对外展示中国道路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影响着中国道路是否能够或多大程度上能够为解决世界的世纪性发展难题贡献伦理价值智慧。

中国在国际交往舞台上出场的频次增加，扮演角色的重要性提升，需要彰显和加深中国伦理价值观念对世界发展的重要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到当前中国外交“亲、诚、惠、容”的理念，从改革开放的提出到“一带一路”倡议，从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在《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中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金规”到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从“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到强调“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向来都以积极的姿态倡导伦理价值、参与国际交往。“在21世纪的文献中，中国崛起已成为一个公理性观点。”①今天，中国想要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地融入世界、影响世界，需要进一步展示中国伦理价值的当代意义和未来引领。

中国道路的成功不仅是大国发展模式的成功，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中国有责任为世界发展贡献伦理智慧。中国在努力破解自身后发展难题的过程中，正逐渐实现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目标的全方位推进和伦理价值诉求的实现，并成功塑造了后发展国家的榜样。就政治伦理价值而言，中国道路积极谋求稳定与发展；就经济伦理价值而言，中国道路致力于实现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合理化，破除“有增长无发展”；就文化伦理价值而言，中国道路积极实现传统文化的价值自觉与先进文化的价值自信，摒弃“无根发展”；就生态伦理价值而言，中国道路努力推进可持续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破解“无未来增长”；就社会伦理价值而言，中国道路努力实现深化发展、内涵扩张、消费拉动、体制活力，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避免社会转型危机。在新时期，我们需要更多的理性和更大的勇气，要对中国伦理价值的历史传承和现代创新充满信心，越自信越开放，越开放也越自信。

① David Scott, *The Chinese Century*?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ian, 2008, p. 14.

三、中国伦理自信之建立

面对全球话语权“西强我弱”的格局和自身“国大声弱”的困境,“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成为中国国际交往的热点话题。但是我们常常重视经济和政治交往的话语权,而忽视向世界传递价值观念和伦理主张的道德话语权。道德话语权彰显了伦理自信及其自信程度,是我们赢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认同、道德信赖和国际道义支持的关键。毋庸讳言,当前中国伦理自信状况还未真正承担起中国崛起所应该赢得的尊重。如何建立中国伦理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紧迫课题。

(一)筑牢根基:以先进文化涵养伦理自信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伦理价值的创造亦是如此,伦理自信不是无根的“盲目自大”或“缥缈憧憬”,只有在已有文化条件的滋养下并以文化自信为根基,伦理自信才能枝繁叶茂。

提升对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时代创新的文化自信,在文化自信中萃取伦理自信的精神基元,这是文化涵养伦理自信的必然途径。文化自信不能仅仅停留在倡议层面,我们需要对已有文化进行伦理价值层面的系统梳理、总结、提炼和清晰认知。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孕育中国传统伦理价值、革命伦理价值、社会主义先进伦理价值,这些伦理价值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是伦理自信之树成长壮大、生生不息的营养来源。

首先,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宝贵的伦理价值和伦理精神追求,摒弃无根的伦理自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价值追求,如“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精忠报国”的爱国精神、“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等等,这些精神财富是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所在,并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奋发进取的精神动力。任何国家当代伦理价值的建构都必须基于传统伦理价值的“路径依赖”,“如果一个国家不知道自己过去从何而来,不知道已面临的现实制约、传统影响以及文化惯性,就不可能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② 一个民族要成为一个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② [美]劳伦斯·卡弘:《哲学的终结》,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大的民族，必须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语言背后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价值支撑。如果失去了文化发展中珍贵的伦理价值传统，也就失去了“根”，没有“根”的文化是谈不上走向世界的。

其次，撷取共和国红色革命文化的政治伦理价值，打造富有“韧性”的伦理自信。革命文化是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特殊形态政治文化，其重要特色就是充盈着民族抗争、奋斗、前进的精神凝练。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认为，政治文化是一定时期内一个民族特定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它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政治进程所促成的。中国红色革命文化孕育的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乐于吃苦、勇于战斗、重于求实、善于团结的“长征精神”，政治坚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断开拓的“延安精神”，坚韧不拔、绝不屈服、团结御敌、众志成城的“抗战精神”，这些革命精神空前地启迪和激发了民族觉悟和伦理自信，使中国人民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紧紧地黏合在一起。

最后，激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新创造活力，打造富有时代性的伦理自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含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不是时间性的特征描述，更不是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而是其中伦理价值内涵的更新和伦理价值引导力的创新。先进文化之所以具有积极引领的作用，其要害在于先进文化蕴含着经过历史沉淀和时代创新“双重发酵”而呈现的恒久弥新的伦理价值，这些伦理价值是最容易以清晰概念、简明逻辑、朴实风格、震撼精神让广大民众所认同、内化和践行的。

从文化中提炼精髓、获取支撑，文化自信只有作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才能真正在塑造伦理自信中发挥基础作用。就此意义而言，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的“根系”供养，就没有伦理自信，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建设新型伦理共同体：以国家伦理引领伦理自信

提升伦理自信，关键是塑造国家伦理，其中包含着两个紧密的命题：其一，国家是一种具有“总体性”的伦理理念；其二，社会主义是具有“当代性”的新型伦理共同体。就其工具性而言，国家首先是一种政治手段；就其价值性而言，国家是一种以追求善好为目的的伦理共同体；就其不可推卸的伦理责任而言，国家总是以追求善好为目的，并在这种追求的实践中实现自我的更新、发展和完善，即是说国家首先是作为一种伦理理念而存在，并且与国家作为“利维坦”的工具性并行不悖。需要指出的是，国家作为一种伦理理念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